

夫差形象塑造与《国语》的文学价值

裴登峰

提 要 在《国语》之《吴语》、《越语》中,夫差表现出了“傲”、“横”、“莽”、“毒”、“狠”、“昏”等性格特点;亡国之后的自杀之举表现出了夫差的血性和刚烈,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的英雄之名。夫差丰富多面的性格刻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《国语》的文学价值。

关键词 夫差 《国语》 文学价值

在春秋诸侯国的兼并战争中,吴、越争霸无疑是重大的历史事件。两国自前 544 年交战,前后断续争战 70 余年。前 505 年越王允常攻入吴国;前 496 年勾践即位当年,吴王阖庐伐越,大败,阖庐身亡,夫差即位,立志报仇。夫差与勾践自此正式登场,拉开正面交锋的序幕。先秦典籍中,《国语》最为详尽地展现了气势恢宏、波澜壮阔的吴越争霸的历史画卷,其刻画夫差等艺术群像,成就斐然。

作为吴越争霸的主角之一,夫差在胜越前后性格、心理、言行截然不同,判若两人。夫差的心态随着对外扩张的不断胜利而变化,并走向极端,最终导致彻底失败。据《左传·定公十四年》记载,周敬王二十四年(前 496 年),“吴伐越,……越子因而伐之,大败之。……夫差使人立于庭,苟出入,必谓己曰:‘夫差,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?’”可见在即位之初,夫差志在雪耻,因而能自我克制、约束、警惕,终于不仅使越臣服于吴,甚至金戈铁马、气吞万里、横行南北、不可一世,有“欲霸中国以全周室”(《史记·吴世家》)的雄心和实力。但随着对越复仇的成功,夫差本性中的一些致命弱点逐渐显露出来。

《吴语》写夫差“将许越成”时,其重要谋臣申胥劝道:“不可许也。夫越非实忠心好吴也,又非惧畏吾兵甲之强也。……夫固知君王之盖威以好胜也。”韦昭注“盖,犹尚也。”崇尚武力、好胜心强是夫差个性中致命的弱点之一。勾践阵营中,大夫文种对此心理,洞若观火,了如指掌。《吴语》云:“吴王夫差起师伐越,越王勾践起师逆之。大夫种乃献谋曰:‘……王不如设戎,约辞行成,以喜其民,以广侈吴王之心’。”文种“行成于吴”时对夫差说,“寡君勾践……不敢彻声闻于天王”(《越语上》)一番谄媚的说辞,满足了夫差虚荣、自得、自大、自负的心理,所以他满足了越国的要求,与其讲和。

在吴答应与越讲和时,申胥曾提出一系列高见,并一再苦谏:

不可许也……为虺弗摧,为蛇将若何——《吴语》

有吴则无越,有越则无吴,……夫越国,……君必灭之——《越语上》

吴越不可两立,申胥之言切中了要害。《左传·哀公元年》还记载申胥用谚语、史实

作论据,从理论上阐明灭越的重要性。可是,夫差对申胥的谏言不屑一顾,置若罔闻。奸臣太宰嚭对夫差喜欢阿谀奉承的心理揣摩得非常透彻,同时他又接受了勾践的贿赂,因此进言:“嚭闻古之伐国者,服之而已。今已服矣,又何求焉?”(《越语上》)夫差果然“赦越,罢兵而归”(《史记·越世家》),在战略上犯了放虎归山的致命错误,埋下了日后灭亡的祸根。越则因此有机会“十年生聚,而十年教训”(《左传·哀公元年》),终至灭吴。

夫差随后逞一胜之勇,得意忘形,骄横跋扈。下面几段文字,便淋漓尽致地表现夫差这种心理。

吴王夫差乃告诸大夫曰:“孤将有大志于齐,吾将许越成,而无拂吾虑。若越既改,吾又何求?若其不改,反行,吾振旅焉。”

吴王曰:“大夫奚隆于越?越曾足以为大虞乎?若无越,则吾何以春秋耀吾军士?”

吴王乃许之,荒成不盟。——均见《吴语》

夫差不谙时势、不纳忠言、盲目自大、狂妄骄横,视越为囊中之物,可以任意把玩。夫差后来伐齐、与晋争长退于黄池,并向周天子报功:“吾先君阖庐不贯不忍,被甲带剑,挺铍搢铎,以与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举……今齐侯壬不鉴于楚……夫差不贯不忍,被甲带剑,挺铍搢铎,……夫差岂敢自多”(《吴语》)。说是不敢“自多”,实则透露出了不可遏制的傲气与夸耀、自赏与得意。

在夫差向外扩张的过程中,申胥一再苦谏,如夫差“大戒师徒,将以伐齐”时,申胥说:吴国应该对付的是越国而不是中原诸国。

今越王勾践恐惧而改其谋,……越之在吴,犹人之有腹心之疾也。……今王非越是图,而齐、鲁以为忧。夫齐、鲁譬诸疾,疥癣也,岂能涉江、淮而与我争此地哉?将必越实有吴土。——(《吴语》)

申胥力谏未果,又以史为鉴,引用楚灵王“不君”乃至众叛亲离的事例,以警示夫差:

昔楚灵王不君,其臣箴谏以不入,乃筑台于章华之上……逾诸夏而图东国,三岁于沮、汾以服吴、越。其民不忍饥劳之殃,三军叛王于乾谿。王亲独行,屏营彷徨于山林之中,三日乃见其涓人畴。王呼曰:“余不食三日矣。”畴趋而进,王枕其股以寝于地。王寐,畴枕王以璞而去之。王觉而无见也,乃匍匐将入于棘闾,棘闾不纳,乃入芋尹申亥氏焉。王缢,申亥负王以归,而土埋之其室。——《吴语》

申胥用楚灵王的故事作类比,意为吴王做法,是灵王的翻版,灵王的昨天,即吴王的明天!楚灵王“余不食三日”哀叹,与《三国演义》写袁绍兵败想喝点蜂蜜水而不得之情形,如出一辙!

只可惜,夫差被暂时的强大、胜利冲昏了头脑,处在麻木、眩晕的非理性状态,自我陶醉、刚愎自用。对申胥的劝谏,夫差根本听不进去,伐齐侥幸取胜后,还训斥申胥:“今大夫老,而又不自安恬逸,而处以念恶,出则罪吾众,挠乱百度,以妖孽吴国”(《吴语》)。申胥见夫差骄横跋扈、不可救药,他不忍心看到吴国灭亡,于是挥剑自杀。可是,申胥之死,非但未能唤醒夫差正常的理智,反而加速了吴国的灭亡。申胥死后,“吴任嚭政”(《史记·越世家》)。这正好应了楚国大夫子西“国家将败,必用奸人”(《楚语下》)之论。

夫差一味我行我素、放纵野心、穷兵黩武,先后侵陈、蔡,伐鲁,攻齐。艾陵胜齐后,“乃使行人奚斯释言于齐”(《吴语》)一番话,居高临下、盛气凌人,极尽嘲笑、讽刺之能

事,可见夫差是何等骄横!接着,“不稔于岁,乃起师北征。阙为深沟,通于商、鲁之间,北属之沂,西属之济,以会晋公午于黄池。”(《吴语》)结果导致“吴士兵罢弊,轻锐尽死于齐、晋”、《史记·越世家》)“稻、蟹不遗种”(《越语下》),造成“大荒荐饥,市无赤米,而困鹿空虚,……天占既兆,人事又见”(《吴语》)的局面,不亡何图?

除上述情形外,夫差还私欲膨胀、骄奢淫逸。《楚语下》载楚国大夫蓝尹亹言:“今吾闻夫差好罢民力以成私好,纵过而翳谏。一夕之宿,台榭陂池必成,六畜玩好必从。”《越语下》亦载其“淫于乐,而忘其百姓。”《左传·哀公元年》言夫差“宿有妃嬙嫫御焉。一日之行,所欲必成,玩好必从。珍异是聚,观乐是务。”从文学的角度看,对夫差种种淫逸行为的记载,很大程度上增强了《吴语》、《越语》的趣味性、故事性,对形成“《吴》、《越》多恣方”风格^①,大有裨益。

综上所述,夫差性格可概括为“傲”、“横”、“莽”、“毒”、“狠”、“昏”。曾至吴并与夫差交谈过的子贡评价说“吴王为人刚猛,群臣不堪。”(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)当取得暂时的胜利时,他趾高气扬,视天下诸侯如无物,毫无顾忌地攻城略地、盲目扩张,体现了心智与政治上的不成熟。当申胥所说的“腹心之疾”发作,即越国趁“吴、晋争长未成”而“乱”时,他马上乱了阵脚,“乃合大夫而谋”(《吴语》)晋使董褐看出了他的恐惧,回告赵鞅云:“臣观吴王之色,类有大忧。小则嬖妾、嫡子死,不则国有大难,大则越入吴。”(《吴语》)

当王孙雒提出“必会而先之”的建议时,“王乃步就王孙雒曰:‘先之,图之将若何?’……吴王许诺。”曾几何时,气宇轩昂、不可一世的夫差,此时却思维迟顿,束手无策,只能自欺欺人、封锁消息。

于是,穷途末路、作困兽犹斗的夫差像赌红了眼的赌徒,做孤注一掷的垂死挣扎。有趣的是,《国语》作者浓墨重彩、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夫差排兵布阵的场面。夫差将士兵排列成白、红、黑三色三个方阵。白色方阵“望之如荼”,“王亲秉钺,载白旗以中阵而立”;红色方阵“望之如火”;黑色方阵“望之如墨”。又加之“王乃秉枹,亲就鸣钟鼓、丁宁、鐃于振铎,勇、怯尽应,三军皆辟钹以振旅,其声动天地”。这一段全局性的战阵描写,在先秦典籍中格外引人注目。这一景象,不仅“宛若一幅色彩绚丽的画卷,再现了当时吴师严整的阵容和强大的军威,千年之下读来宛在目前。”^②而且“从形势危机、以计谋度过险情而言,似《三国演义》中诸葛亮巧用空城计一段,而就写吴军战阵之气势而言,也很像《三国演义》中一些大的战阵。”^③文风朴素却不失流畅、奔放。难怪柳宗元《非国语序》,不由得赞叹“其文深闳杰异,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。”南宋周密的名文《观潮》关于水军演习的宏大场面,以及“吴儿”弄潮高超绝技的描写,似受此影响。
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夫差决一死战的恢弘壮观的战阵,虽然吴军有“怯”者,而且使“晋军大骇不出”,可是在他人眼中看来,却不是“勇”而是“毒”,是急红了眼的赌徒心理。董褐即云“将毒,不可与战”。夫差命少司马兹等六人自杀以谢客的残忍行为,也是其歇

① 崔述《洙泗考信余录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5年版,第52页。

② 陈桐生《〈国语〉的性质和文学价值》,《文学遗产》2007年第4期。

③ 赵逵夫《论先秦时代的讲史、故事和小说》,《文史哲》2006年第1期。

斯底里心理的反映,让人瞠目结舌!① 面对此情形,权衡、度量后,“晋乃令董褐复命曰……孤敢不顺从君命长弟”。但即使在“勾践乃命范蠡、舌庸,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”、“越闻愈章”的情况下,“夫差还自黄池,息民不戒”(《吴语》)。终于,噩梦未醒,厄运降临——勾践的刀已架在了他的脖子上!

夫差的人生,从无限辉煌到国灭身死,经由了三部曲:立志复仇时锐意进取、复仇之后盲目扩张、国灭之后苟且偷生,三阶段结合起来,完整地构成了其性格、心理的多面性、层次性、复杂性。勾践灭吴后,告诉夫差“王其无死,……夫妇三百,唯王所安,以没王年”(《吴语》),“吾请达王甬句东,吾与君为二君乎”(《越语上》)。貌似同情,实则戏弄。《左传·哀公二十年》载,吴王“使问赵孟曰:‘勾践将生忧寡人,寡人死之不得矣。’”即勾践意图与夫差玩猫戏老鼠的游戏,不速死之而将其玩于鼓掌之上。对于曾目空一切的夫差来说,这种精神上的戏弄与折磨,真是情何以堪。夫差清楚地知道,他不可能再有机会复国“昔天以越赐吴,而吴不受命;今天以吴予越,越可以无听天之命,而听君之令乎”(《越语上》)?与其苟且偷生,倒痛快就死。夫差在经历了“悲哀—狂妄—覆灭”的人生剧变之后,终于勇敢地选择了死亡。

夫差的自杀蕴含了多层意思:一是由胜转败,由威风八面的英雄成为永无翻身之日的阶下囚,地位的悬殊变化,使他无法承受;二是勾践灭吴之后对他的戏弄和羞辱;三是如果国灭而自己苟活,将无颜面对诸侯和自己的臣民,他曾长叹“孤何以视于天下”;(《吴语》)四是悔恨交加。《史记·吴世家》载,夫差曾云:“吾悔不用子胥之言,自令陷此。”《吴语》亦载“夫差将死,使人说于子胥曰:‘使死者无知,则已矣;若其有知,吾何面目以见员也!’”相当初,申胥一再劝戒、警示,并不惜以死相谏,夫差却以侮辱申胥的尸体作为回答,如今忠臣之言犹在耳边,夫差已成亡国之君,真是悔之晚矣!

夫差的描写和刻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《国语》的文学特点和价值。事实上,《国语》虽是先秦“语”书之一种,但“语”的方式有一定的丰富多样性,其中也蕴涵了一定的文学性因素。《周语》、《鲁语》主体为个人议论或对话的“语”,只有引出“语”的背景,或结果交代为叙事,且多为一事一议;《齐语》不仅叙事成份明显增多,且不限于一事;《郑语》通过桓公与史伯的问对,以史带议,纵论、预测天下时势,纵横捭阖;《晋语》、《吴语》、《越语》则以叙事为主,其中《晋语》几乎占了《国语》一半的篇幅。《晋语四》“文公即位二年”及《郑语》的第二条材料均为纯叙事,有“纪事本末”端倪。这些都说明《国语》不只记治国之“嘉言善语”,亦讲述“邦国成败”(韦昭《国语解叙》)的“事”、“语”兼具性质、特色。其中“语”也不止“治国之善语”,②也有“说话”,即讲故事的成份,正如上文所分析的,《吴语》、《越语》以及其他相关资料,不仅比较完整地拼接出了吴越争霸的历史故事,而且相当成功地刻画了栩栩如生的夫差等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。

① 韦昭引贾、唐之说云“将报客,使死士自刭,以示其威行,军士用命也。”其视生命如草芥,用戕害生命完成一种示威仪式。由此可体会到在“争地以战,杀人盈野;争城以战,杀人盈城”(《孟子·离娄上》)的“春秋无义战”(《孟子·尽心下》)时代背景与环境下,提出“和”、“大同”、“兼爱”、“非攻”、“王道”、“仁政”之类的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思想主张的可贵。

② 《国语·楚语上》申叔时给楚太子所列“教之语”韦昭注。见徐元诰《国语集解》,北京:中华书局2002年版,第486页。

即使就记事而言,虽然说历来公认“左氏文体,剪裁严密”^①,但是在一些细节描写方面,《左传》甚至有不及《国语》的地方,如骊姬乱晋、重耳流亡等均是,吴越争霸则更为典型。对此,学界多有关注。傅玄认为,《国语》与《左传》,“凡有共说一事,而二文不同,必《国语》虚而《左传》实”。^②李涂认为“《国语》不如《左传》,《左传》不如《檀弓》。叙晋献公、骊姬、申生一事,繁简可见”(《文章精义》卷一)。崔述认为:“《左传》之文,年月井井,事多实录,而《国语》荒唐诬妄,自相矛盾者甚多;《左传》纪事简洁,措词亦多体要;而《国语》文词支蔓,冗弱无骨”。^③这些说法有合理成分,但囿于经学与文体正统等多种观念的限制,评价未免失之偏颇。他们否定的有些方面,恰好突出《国语》文学价值的独特性。“虚”、“繁”正好说明《国语》在一些方面,文学性强于《左传》。《国语》对夫差性格的开放式、动态性、复合型描写,则在叙事文学中树立了样式,即不是定型、静态的横截面,而是在吴、越争霸的历史演进过程的特定环境下,在故事情节的动态推进中,将人物置于具体事件里,通过侧面烘托的间接描写,特别是自身言行的正面、直接展示等多种艺术手法,勾勒了夫差性格渐进变化的轨迹,演绎其日益成熟、丰满、立体的性格成长史,刻画了一个执迷不悟、自掘坟墓的悲剧英雄的典型。

《国语》艺术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,就是采取对比的方法叙事。在吴越争霸的描述中,叙述者将两国情况、谋士,尤其是将夫差与勾践的性格、心理、行为等一一进行对比。“两国政治风格也有诸多不同点:吴谋浅而越谋深,吴阳刚而越阴柔,吴狂嚣而越深沉,吴逞志而越隐忍。”^④在吴胜越至越灭吴的大部分时间内,军事力量上吴、越未形成对等的抗衡局面,更谈不上战场上的较量。起主要作用的,是受个性因素影响、甚至制约的智谋的运用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云:“上古竞于道德,中世逐于智谋。”《吴语》中申包胥提出“夫战,智为始”主张,以及作者的议论“越灭吴,……夫唯能下其群臣,以集其谋故也”,均突出强调了这一点。故刘熙载言:“《晋》、《越》多谋”(《艺概·文概》)。所以,夫差与勾践,以及各自的谋士,主要在斗心、斗智。勾践一方以范蠡、文种为首的智囊,戮力同心,夫差一方则有以“智而好谋”(《史记·楚世家》)的申胥为代表的忠臣以及以太宰嚭为代表的奸臣。两大阵营及各自阵营内部,形形色色的人物,各怀智谋、心机,各具声气、情态,或忠诚,或奸邪,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,扮演了不同的角色,进行了不同的表演,从而鲜活地再现了那群人物,那段历史。这样的艺术手法,对后代“演义”小说以及戏曲,有明显影响。

尽管勾践屡称“吴为不道”(《吴语》),但吴越均谈不上正义,勾践、夫差无所谓道德高下。事实证明更加阴险、狡猾的勾践,^⑤才是真正的阴谋高手与强者!与多计谋、善权变、重机心,又能败而不馁、能屈能伸的勾践相比,夫差简直就是一个头脑简单、有勇无谋

① 陈柱《中国散文史》,上海:上海书店1984年版,第43页。

② 《春秋左传正义》“哀公十三年”“乃先晋人”句孔颖达疏。北京:中华书局1957年版,第2389页。

③ 崔述《洙泗考信录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5年版,第52页。

④ 陈桐生《〈国语〉的性质和文学价值》,《文学遗产》2007年第4期。

⑤ 《国语·越语下》记灭吴后,“反自五湖,范蠡辞于王,……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,莫知其所终极。”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则透露了范蠡为何离去信息。“范蠡遂去,自齐遗大夫种书曰‘飞鸟尽,良弓藏;狡兔死,走狗烹。越王为人长颈鸟喙,可与共患难,不可与共乐,子何不去?’”“种见书,称病不朝。人或谗种且作乱,越王乃赐种剑曰‘子教寡人伐吴七术,寡人用其三而败吴,其四在子,子为我从先王试之。’种遂自杀。”

的匹夫! 二人的个性差异,对两国策略、措施有很大影响,使命运出现了戏剧性且翻天覆地的变化,也导致吴越争霸的历史事件,带上了鲜明的个性色彩。后代小说中,如《三国演义》描写战争,主帅的性格影响甚至决定着战争的过程与结果,也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。如官渡之战,袁绍、曹操的做法,许多方面与夫差、勾践何其相似乃尔,结果也惊人的一致!

可以说,自勾践降吴始,吴、越就已谈不上“争”,而是勾践与谋士们“玩”夫差的过程。申胥之说,早就道破天机:“大夫种勇而善谋,将还玩吴国于股掌之上,以得其志。”(《吴语》)而文种则告诫勾践:“夫谋必素见成事焉,而后履之,不可以授命。”(《吴语》)勾践不仅用最卑微的方式,玩着最大、最高明的阴谋,就是后来渐趋强大时,策略上也声东击西。如《左传·哀公十九年》载:“越人侵楚,以误吴也。”勾践的政治素质堪称一流,表演达到了极致,是中国历史上超一流的大“玩”家,故玩出了惊天巨变,成了大赢家。夫差如同貌似威武强大、张牙舞爪的一只木偶,被处心积虑力图复国的勾践牵着,一步步走向灭顶之灾!起初看似夫差为主角,但实际上他是在为勾践的最终成功做铺垫。真正的主角,经过卧薪尝胆的磨砺,特别是精心准备,一旦登场,便让世人侧目不已!惊叹其所做的一切,无不都是“玩”夫差的表演!吴、越争霸的历史,好似勾践先“放”后“捉”夫差的游戏过程。大幕最终以勾践完胜而落下!故柳宗元以为“《越语》尤奇峻。”(《非国语序》)陶望龄曰:“如其妙理玮辞,骤读之而心惊,潜玩之而味永,还须以《越语》压卷。”^①夫差在二十余年间,由称雄天下而国破身死,很好地诠释、印证了“盛衰之理,虽曰天命,岂非人事”(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)的哲理、定律。吴之亡,不是夫差认为的“天既降祸于吴”(《吴语》)乃自取其祸也!勾践因失败而胜利,夫差因胜利而灭亡!灭吴者,在越更在吴也!所以在吴者,多缘夫差恣意妄为,给勾践提供了可“玩”的空间与机会也!是夫差自己“玩”完了一切,给吴国和自己划了句号,成就了让后世叹惋的一个悲情豪杰,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!并在一定程度上,也成就了《国语》的文学价值!

(作者通讯地址:裴登峰 北京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100024)

(责任编辑 晓 宁)

^① 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卷二百九,北京:中华书局1998年版,第1072页。